中外关系

# 17－19 世纪中叶中日书籍交流史的经济学分析：以地方志为例*

巴兆祥

［摘要］17－19 世纪中叶是中日书籍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书籍交流的方式较以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汉籍除了传统的文化交流物品属性外，又增加了贸易商品的特性。本文以地方志为例，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 17－19 世纪中叶中国输日方志的数量、渠道、价格与利润，探索了中日方志贸易的特性以及日本重视方志收集的原因，进而从一侧面加深了人们对地方志在中日书籍交流史上意义的认识。

［关键词］方志　书籍史　贸易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8）－02－0037－12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Exchange of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Mid－Nineteenth Centurie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

The era of the seventeenth to mid－nineteenth centuries was one when the exchange of book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as most frequent and common. The pattern of book exchange also changed greatly. Besides being article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Chinese classic works took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ercial goods. Taking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umber, channel, price and profit of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 export to Japan from seventeenth to mid－nineteenth centu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The article also pro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gazetteers trade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Japanese collection of local gazetteers.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obt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 in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日本输入中国地方志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 9 世纪中后期的唐代即日本平安时代贞观、宽平间，已有南朝顾野王《舆地志》、《十州记》，唐李泰《括地志》、《州县图经》、《扬州图经》、《海州图经》等中国地方志在日本流传。[①]到明末清代（日本江户时代），方志已经超越了一般文化物品的内涵，更作为一种重要的贸易商品，以中国商人走出国门来到日本的方式，在中日间架起了一道别具特色的经贸桥梁。尽管近年学界有关中日书籍史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对其中的地方志的关注较为罕见[②]，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中日方志贸易的则还没有见到。

## 一、输日方志的数量

17－19 世纪中叶，即日本的江户时代，汉籍大量东传日本。据长崎“书物改役”向

［收稿日期］2007－8－10

［作者简介］巴兆祥（1964—），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

井富编纂的《商舶载来书目》记载，1693－1803年的111年间，共有43艘中国商船到长崎港，共运去汉籍4781种。[③]地方志作为汉籍的一种，也被赴日唐船输出到日本。

从现有史料看，方志被批量贩卖到日本约始于明末。名古屋尾张藩《御文库御藏书目录》记载，该文库藏《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名胜志》、《福州府志》（万历）、《郧阳志》（万历）、《郧台志》（万历）、《全椒县志》（泰昌）、《钱塘县志》（万历）、《衡岳志》、《惠安县志》（嘉靖）、《惠安县续志》（万历）、《大岳太和山志》、《鼓山志》、《西湖志》即购于此时。[④]幕府御文库也在1641年购入《合州志》（万历），1644年购入《闽书》（崇祯），1645年购入《姑苏志》（正德），1646年购入《八闽通志》（弘治）、《淳熙三山志》、《修志文移》[⑤]。到清雍正、乾隆、嘉庆年间，方志输出日本达到高潮，有个别年份还特别多，如1726年（雍正四年，日享保十一年）有《江都县志》（万历）、《沛志》（万历）、《徐州志》（顺治）、《嘉定县志》（康熙）、《金坛县志》（康熙）等114部志书，1805年（嘉庆十年，日文化二年）有《太平寰宇记》、《崇明县志》（康熙）、《扬州府志》（雍正）、《天津县志》（乾隆）、《重修建德县志》（乾隆）、《阜阳县志》（乾隆）等185部志书被唐船携带到日本。道光以后，尽管也有输出，但数量已大为减少。[⑥]

有关唐船贩运日本的方志数量，《古渡新渡唐本类书考》有一概述："近年来有很多明清书籍舶运至崎港，其数量难以胜数。我很小的时候游历京师，后改行经营书店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查找国内流传的那些丛书，希望能注上书目卷数、编者姓名，为部分丛书辑录一份书考……醉墨斋说，上述十五省通志是清康熙年间编辑的。中有先明府志、县志，目次他日再作考证。还有一本《盛京通志》、一本《畿辅通志》……总计七百七十四本。"[⑦]也就是说，在18世纪（日享保至宽延间）的日本图书市场上流通着许多志书。至于总量，日本学者大庭脩先生曾有过统计，约有561种（部）。[⑧]大庭脩先生的统计有开创之功，但仍有不少遗漏。笔者据《舶载书目》、《商舶载来书目》、《琼浦又缀》、《自文化三年至文政五年新收书目》、《御文库目录》等进行不完全统计，17－19世纪中叶中国输出日本的方志约有1245部。其中，有纪年可考的方志约1026部，其纪年输入构成如下：

**表1　江户时代日本输入方志统计表**

| 年代＼种类 | 总志 | 通志 | 府志 | 州志 | 县志 | 乡镇志 | 合计 |
|---|---|---|---|---|---|---|---|
| 元和（1615－1623） | 1 | | | | | | 1 |
| 宽永（1624－1643） | 4 | | 4 | 1 | 4 | | 13 |
| 正保（1644－1647） | | 2 | 2 | | | | 4 |
| 庆安（1648－1651） | 1 | | | | | | 1 |
| 承应（1652－1654） | | 1 | 1 | | 1 | | 3 |
| 明历（1655－1657） | 1 | 3 | 5 | | | | 9 |
| 万治（1658－1660） | | 1 | 2 | | 4 | | 7 |
| 贞享（1684－1687） | | 3 | | | 1 | | 4 |
| 元禄（1688－1703） | 6 | 2 | 11 | 4 | 34 | | 57 |
| 宝永（1704－1710） | 1 | | 1 | | | | 2 |
| 正德（1711－1715） | 1 | 1 | 1 | | | | 3 |
| 享保（1716－1735） | 4 | 49 | 90 | 44 | 328 | 4 | 519 |
| 元文（1736－1740） | 1 | | | | 1 | | 2 |
| 宽延（1748－1750） | | 15 | | | | | 15 |
| 宝历（1751－1763） | 6 | 1 | 2 | | 2 | | 11 |

续表

| 种类<br>年代 | 总志 | 通志 | 府志 | 州志 | 县志 | 乡镇志 | 合计 |
|---|---|---|---|---|---|---|---|
| 明和（1764－1771） | | 17 | 1 | | | | 18 |
| 天明（1781－1788） | 2 | | 4 | | 2 | | 8 |
| 宽政（1789－1800） | 4 | 18 | 4 | 2 | 24 | | 52 |
| 享和（1801－1803） | 5 | | | | 9 | | 14 |
| 文化（1804－1817） | 35 | 11 | 32 | 24 | 144 | 2 | 248 |
| 天保（1830－1843） | 9 | 2 | 1 | 1 | 1 | 2 | 16 |
| 弘化（1844－1847） | | | | | 4 | 1 | 5 |
| 嘉永（1848－1853） | 8 | 2 | | | 2 | 2 | 14 |
| 总计 | 89 | 128 | 161 | 76 | 561 | 11 | 1026 |

资料来源：《舶载书目》、《商舶载来书目》、《琼浦又缀》、《琼浦杂缀》、《自文化三年至文政五年新收书目》、《享保十八年癸丑火禾长崎售书并新渡书目》、《宝历三年八丈岛飘着南京船资料》、《元禄元年唐本目录》、《尾张德川家藏书目录》、《壬寅入津唐本大意书抄》、《御文库目录》、大庭脩《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资料编》、大庭脩《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等。

上述的1245部其实也是个近似值，如进一步挖掘资料，数量还会有些提高，不过就已掌握资料看，增加的数量会有限。

如此多的方志输出日本，原因当然是多方面，撇开商人逐利，主要有二：其一是中国持续编纂方志，为方志出口提供了充足的货源。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方志编纂的兴盛时期，上至朝廷，下迄地方官府及个人，多重视地方志。1418年，明朝下令修志，颁行中国方志史上首个官定《修志凡例》。1673年，清康熙皇帝采纳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的建议，“诏天下直省、府、州、县咸修辑志书，于是直省有司各设馆，饩集高才生以从事。”[9]1729年，雍正皇帝定省、府、州、县志60年一修，“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及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10]修成的志书遍布全国各地。“下至府州县，虽僻陋荒岨，靡不有志。”[11]据不完全统计，不计复本，仅明嘉靖至崇祯间编印的现存志书约有842种，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修的现存志书约有2960种。[12]供出口的方志货物十分充足。其二是日方需求大。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一个武功文治双修的时代，总体上讲，社会稳定，经济繁荣，重视文教，对方志等汉籍需求广泛。幕府的御文库是唐船持渡方志的主要买主，在长崎的书物奉行、书物改役、书物目利等都负有为幕府选书、购书义务。御文库在1720年以前购买方志不多，仅29部。此后，因德川吉宗的重视，唐船贩运到长崎的方志多进入御文库。《有德院殿御实纪附录》记载[13]：

他常召集御侧、小姓、小纳言等，让他们搜索书籍……先下令搜寻本邦古书，后又以唐商携来之书籍杂乱，要求先提供书目御览，然后从中挑选有用之书。但他并不特意寻找诗赋、文章之类的书籍，而是专门搜集对辅国佐政有益之书，比如那些记载了中国情况的府州县志。这样，御文库藏书遂倍增于从前。

到1817年，御文库购藏清代方志已达528部：[14]

两京　通志已收

十四省　通志已收

百九十二府　府志七十一部已收，百廿一部未收

二百三十二州　州志五十二部已收，百八十部未收

千二百六十八县　县志三百八十九部已收，八百七十九部未收

右未收之地志要陆续收集齐全，以继

承有德大君（引者注：德川吉宗）之遗志。于是与林祭酒会商，在本月（引者注：文化十四年十月）四日向京极参政建议，将搜访书目交给长崎镇府，并告知清商陆续将书载来。舶载书目请交林祭酒检阅以收贮。

到幕末的1843年，御文库还要长崎奉行向唐商下订单购买地方志，以补充现藏之不足。[15] 其他藩主、大名、学者也乐意购买地方志。如：加贺藩主前田纲纪购藏约300部，佐伯藩主毛利高标购藏约142部。零散购藏的小户则更多，如文化间的大田南亩收集有《太平寰宇记》、《十道志》、《十三州记》、《南昌府志》、《蒲州府志》等[16]，静山松浦收集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增订广舆记》、《吴兴掌故集》、《松江府志》（康熙）、《扬州府志》（雍正）、《直隶泸州志》（乾隆）、《苏州府志》（乾隆）、《西域闻见录》等志书[17]，难以一一列举。也就是说，地方志在日本有较广阔的需求市场。

## 二、贩运渠道

17－19世纪中叶，日本实行的是锁国政策，日本国民不得出海，外来船舶只允许停靠长崎、平户两港，1636年后仅长崎一港。中日间的方志贸易基本上由中国商人承担，也即依靠赴日唐船将方志贩运至日本。唐船持渡成了方志运销日本的主要渠道。

为便于了解是哪些唐船载运了方志，笔者根据《舶载书目》、《琼浦杂缀》等所能见到的资料制成下表：

**表2 持渡方志唐船一览表**

| 船名 | 信牌地域 | 船主 | 到长崎年 | 方志数（部） |
|---|---|---|---|---|
| | 南京 | | 1685 | 1 |
| 寅12番船 | | | 1686 | 1 |
| 寅15番船 | | | 1686 | 1 |
| 春船 | | | 1695 | 1 |
| 子春船 | | | 1696 | 1 |
| 春船 | | | 1699 | 1 |
| 寅16番船 | | | 1710 | 1 |
| 卯51番船 | 南京 | 程方城 | 1711 | 1 |
| 午1番船 | 南京 | 费元龄 | 1714 | 1 |
| 丑30番船 | 南京 | 费赞侯　陈抡三 | 1722 | 15 |
| 卯1番船 | 南京 | 潘绍文 | 1723 | 10 |
| 卯17番船 | 南京 | 李淑若 | 1723 | 3 |
| 辰4番船 | 南京 | 丁益谦 | 1724 | 2 |
| 巳3番船 | | | 1845 | 4 |
| 巳6番船 | 宁波 | 朱允光 | 1725 | 15 |
| 巳25番船 | 南京 | 沈人长 | 1725 | 7 |
| 午2番船 | 宁波 | 尹心宜 | 1726 | 29 |
| 午3番船 | 广东 | 李亦保 | 1726 | 2 |
| 卯20番船 | 宁波 | | 1735 | 2 |
| 未6番船 | | | 1739 | 1 |
| 戌番外船 | 南京 | 唐山辉 | 1754 | 8 |
| 寅10番船 | 南京 | 沈敬瞻 | 1782 | 1 |
| 卯6番船 | | | 1795 | 16 |
| 卯3番船 | | | 1795 | 1 |

续表

| 船名 | 信牌地域 | 船主 | 到长崎年 | 方志数（部） |
|---|---|---|---|---|
| 卯5番船 | | | 1795 | 31 |
| 亥8番船 | | | 1803 | 4 |
| 亥7番船 | | | 1803 | 1 |
| 亥9番船 | | | 1803 | 2 |
| 子6番船 | | | 1804 | 1 |
| 子12家番外船 | | | 1804 | 1 |
| 丑2番船 | | | 1805 | 1 |
| 丑3番船 | | | 1805 | 7 |
| 丑5番船 | | 陈国振 | 1805 | 83 |
| 丑6番船 | | | 1805 | 10 |
| 丑7番船 | | | 1805 | 57 |
| 丑8番船 | | | 1805 | 30 |
| 午10番船 | | | 1810 | 1 |
| 未9番船 | | | 1811 | 3 |
| 未9番外船 | | | 1811 | 2 |
| 未汪氏番外船 | | | 1811 | 1 |
| 申2番船 | | | 1812 | 2 |
| 未或申临时 | | | 1835或1836 | 6 |
| 酉3番船 | 南京 | 沈绮泉 | 1837 | 1 |
| 酉8番船 | 南京 | 沈绮泉 | 1837 | 1 |
| 亥4番船 | 宁波 | 顾子英 | 1839 | 1 |
| 子3番船 | 宁波 | 邵植斋 | 1841 | 1 |
| 寅2番船 | 宁波 | 王云帆 | 1842 | 1 |
| 寅4番船 | 宁波 | 王云帆 沈萍香 | 1843 | 1 |
| 卯2番船 | 南京 | 顾子英 | 1843 | 1 |
| 巳6番船 | | | 1845 | 1 |
| 申4番船 | 南京 | 杨少棠 | 1849 | 1 |
| 酉1番船 | 宁波 | 程子延 陈逸舟 | 1849 | 1 |
| 酉3番船 | 南京 | 沈在伯 陶梅江 | 1849 | 2 |
| 酉4番船 | 南京 | 钮心园 程子延 | 1849 | 1 |
| 酉5番船 | 南京 | 杨少棠 | 1850 | 1 |
| 酉7番船 | 宁波 | 江星畲 钱少虎 | 1850 | 2 |
| 亥2番船 | 南京 | 杨少棠 顾子英 | 1851 | 1 |
| 子2番船 | 南京 | 杨少棠 陶梅江 | 1853 | 4 |
| 子5番船 | 南京 | 江星畲 钮春杉 | 1853 | 1 |

资料来源：《宝历三年八丈岛飘着南京船资料》、《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资料编》、《圣堂文库赋役府县志目录》、《唐船持渡书物目录留》、《百舌草茎》、《琼浦杂缀》、《琼浦又缀》、《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安永九年安房千仓飘着南京船元顺号资料》、《享保二十年第二十番宁波船赍来目录》、《舶载书目》、《商舶载来书目》、《唐船进港回棹录》。

从表2看，各种资料对持渡方志的唐船记载十分稀少，仅59艘唐船有记录，载运方志390部，约占总数的31.3%。如将表2与表1作比较，可以发现，1715年前的唐船记录极

少，所携带的方志仅9部，与笔者粗略调查的舶载方志数104部相去甚远。1716年后，尽管较以前记载多起来，但也很有限。不过仅就现有资料分析，1716－1735（享保）、1789－1800（宽政）、1804－1817（文化）年间，唐船中有运载方志的比例较高。运载方志基本是南京船、宁波船和个别广东船。运载量除个别较大外，多数仅一部到数部不等。也就是说无论有多少唐船来到日本，载有方志的船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舶载到日本的1245部志书，除总志外，涉及今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陕西、甘肃、新疆、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台湾、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省区。是否所有上述地区的志书都是由现有资料所记载的南京船、宁波船、广东船带到日本去的呢？要解答这一疑惑，需要对唐船出发地作一番考察。在1661年清朝颁布迁海令前，到日本的主要是南京船、漳州船、台湾郑氏船、广东船[18]。1684年，清朝实施展海令，全面开放对日贸易，赴日唐船逐年增加。1688年，日方出于贸易平衡的考虑，规定了配额，唐船航行日本的数量和出发地为[19]：

春船二十艘：南京五艘、宁波七艘、普陀山二艘、福州六艘；

夏船三十艘：南京三艘、泉州四艘、宁波四艘、漳州三艘、普陀山一艘、厦门五艘、福州四艘、广东二艘；

秋船二十艘：南京二艘、高州二艘、福州三艘、宁波一艘、广东四艘、潮州二艘。

1715年，《正德新令》实施所谓的“信牌地割”，到日唐船定为30艘，中国本土的南京船10艘、宁波船11艘、厦门船2艘、台湾船2艘、广东船2艘。[20]再看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此书对当时的中日贸易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列举了中国各省土产，其中南京、福建省特别标识出产书籍。由此可以推测，不光南京船、宁波船、广东船载运方志，其他如福州船、厦门船、泉州船、潮州船、高州船等也有舶载的可能，只是尚未发现记载。

集中在东南沿海几个港口出发的唐船是如何搜集到各省区方志的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地方志属于政书，是地方官施政的参考，由于明清时期雕版印刷术十分成熟与普及，除部分外，多在当地出版。再者，当时学者的关注点多在注经论史，除顾炎武、顾祖禹等少数人外，大多还没有注意到方志在研究历史、社会经济问题方面的价值，偶然利用一、二部方志者有之，但大量利用者很少。藏书家也多嗜好宋元古书、名人名作，大量收藏方志的少，只有少数如天一阁、陈第世善堂、徐𤊹红雨楼、钱曾述古堂等收藏方志较多。收藏方志较多的藏书楼多集中在江浙和福建一带。从经营利润考虑，金陵、杭州、苏州、建阳、成都、徽州等出版业发达之地，翻刻宋元版书、名人著作、话本小说的多，批量出版方志的少，当然名人名志除外。方志收藏与出版的总体特征是大分散，小集中。因此，在唐船出发港及其周边市场上应当有一些方志待售，如苏州，“书肆之盛，比于京师”[21]，有经义斋、五柳居、萃古斋、学余堂书肆、学山堂书坊、敏求堂、闵师德堂、玉照堂、文瑞堂、中有堂、崇善堂、墨古堂、书业堂、文秀堂、芸芬堂、留畊堂、墨林居、朱秀成书坊、大观局、遗经堂、西山堂、本立堂、胡苇洲书肆等云集，唐商应该能收购到方志，特别是出发港所在地附近的方志。江浙方志被舶载较多的原因就在于此。不过，其它地区的方志数量应当十分有限。

那么，其它地区特别是内地的方志是如何流到唐商手中的呢？一种可能是唐商委托内地商人代为收购，另一种可能，来自各地的唐船员或搭乘商人购买、集中而后携运。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按区域记载了对日有贸易关系的清朝15省的户口、风俗、土产、至长崎的道里，更重要的是还记载了唐船的出发地以及船商的来源地，如[22]：

南京省　来长崎的船并商人最多。

唐船出发地：苏州府、松江府、扬州府、常州府、崇明县、淮安府、镇江府、应天府

赴长崎商人来自：凤阳府、安庆府、太平府、庐州府、徽州府、广德府、和州府、徐州府、滁州府、宁国府、池州府

河南省　非在海边，故商人多搭乘南

京船来。

赴长崎商人来自：开封府、汝宁府、归德府、卫辉府、彰德府、河南府、南阳府、汝州府、怀庆府

湖广省　非在海边，商人搭乘南京、福州船到长崎。

赴长崎商人来自：武昌府、汉阳府、襄阳府、德安府、黄州府、荆州府、岳州府、长沙府、衡州府、实［宝］庆府、常德府、辰州府、永州府、承天府、靖州府、郧阳府、永天府、郴州府、施州卫、永顺军民、保靖军民

浙江省　因在海边，津港多，故来日本的船最多。

唐船出发地：宁波府、台州府、温州府、杭州府、舟山、普陀山

赴长崎商人来自：嘉兴府、湖州府、金华府、严州府、衢州府、处州府、绍兴府

从上可知，有配额的省，唐船可以直接到长崎，内地省只能通过搭乘方式到长崎，到长崎的商人来自中国各地。因此，各地方志有可能通过各地去长崎的商人携带到日本。

## 三、输日方志的价格与利润

商人经营书业的根本目的在追求利润。有利润可赚，商人自然会去经营。17－19世纪中叶，日本书商与买家不断向唐商发出订单，唐商又不断将方志携带至日本，都是利益使然。要想探明中日方志贸易的利润问题，关键在方志的售价资料。这涉及中国的市场价、日方输入价、出售价。

有关方志的日方输入价，长崎海关在进行书籍检查时留下一些《书籍元帐》和《落札帐》，尽管在这些海关档案中记载了相当一部分汉籍的价格，然有关方志的很少。据《购来书籍目录》、《书籍元帐》、《百舌草茎》等资料，笔者发现记载有唐船出售原价的方志约有37部，如：

亥七番船　《元丰九城志》　一部一套　十八匁

亥八番船　《元和郡县志》四部各二套　二十二匁

亥九番船　《宝山县志》一部一套新渡十二匁

《洵阳县志》　一部一套　新渡十匁

子六番外船《苏州府志》　一部四套　六十匁

子十二家番外船《广东通志》　一部六套　百拾匁

酉三番船　《南翔镇志》　七匁

亥四番船　《海盐县图经》二套拾五匁

子三番船　《太平寰宇记》一部三拾目

上述基本是江户后期1803－1852年间的方志价格。同一志书，如版本、函册数及成色相近，尽管进口的时间不同，其价格也大体相同。如1841年初子三番船舶载《太平寰宇记》一部，价“三拾目”[23]，次年寅二番船《太平寰宇记》也是“三拾目”。1849年初申四番船携带的《昆山新阳志》一部二包，价格“八匁”，天后人港的酉一番船输入的同书，价格也如此。另外，大田南亩在1804年长崎任内曾作《百年之帐》，记录了13部志书，其中有11部记载了价格[24]，如：

《江山县志》一套　十二匁

《分水县志》一套　付款廿匁

《建德县志》一套　十二匁七步五厘

《天台（县）志》一套　十二匁七步五厘

《开化（县）志》一套　十五匁

《于潜（县志)》一套　十二匁七分五厘

《重修淳安县志》、《重修江浦县志》可能是原稿脱字，未见价款。起初，笔者还以为是他自己购买志书的款项记录，但查考《南亩文库藏书目》，却没有这些志书。这《百年之帐》可能是他抄录当时长崎书籍交易的记录，内记的价格估计是原价。

方志等汉籍要进人日本的一级图书市场，按照江户幕府的规定，得进行投标竞购。方志的书商投标价现仅发现两则资料，一是1843年《太湖具区志》，“十壹匁五分 永井ゃ；十壹匁 三枝；十匁三分 村ト。”[25]二同是《太湖

具区志》，1845 年落札："十匁 三枝；六匁八分 ヒシや；六匁七分 の登や 。"[26]参加投标的书商是永井ゃ、三枝、村卜、ヒシや、の登や，村卜即村上藤兵卫，他们投标的价格也有上下。对一小小的乡镇志，居然有五家书商来投标，三枝还投标两次，说明地方志在日本市场颇受欢迎。因在原价志书中找不到同样的《太湖具区志》，我们无从考知原价与投标价间的差额。

据中泽弁次郎《日本米价变动史》记载，1804 年米价一石折 55 匁[27]，以此换算，是年由子六番外船携带的《苏州府志》进口价相当于 1.09 石大米，子十二家番外船舶载的《广东通志》进口价相当于 2 石大米，《江山县志》进口价相当于 0.22 石大米。可见，日方的志书输入价相当高。即使价格昂贵，因需要和喜爱，还是有许多人购买。"唐山书籍历年带来颇夥，东人好事者，不惜重价购买，什袭而藏，每至汗牛充栋。"[28]

方志经书商在长崎中标后投放各地书肆的销售价格，也是读者感兴趣的问题。目前能查到江户时代有关书店经营地方志的资料极少。位于江户曲町的唐本屋田中清兵卫，1688 年曾编一本《唐本目录》，记录店藏待售方志 32 部，很遗憾缺载价格。令人兴奋的是在《新渡唐本市控帐》[29]中有了一些记录：

天保二辛卯岁五月十二日（1831 年6月21 日）于木津仁

一、《吴门补乘》七十七匁壹分 河喜

一、《太平寰宇记》三百六十九匁 河吉

一、《畿辅通志》二百十匁 河も

卯八月十九日 京都

一、《吴县志》六十匁 龟太

辰三月廿五日 藤山

一、《广舆记》三匁 ふじ源

对书店的简称、本名，弥吉光长《大阪之书店和唐本輸入》作了对照表，河喜即书店河内屋喜兵卫，河吉是河内屋吉兵卫，河も是河内屋茂八，龟太即龟屋太兵卫，ふじ源即藤原源助。

此处，我们以上述《太平寰宇记》为例，在版式、品质、输入时间等因素均忽略不计情况下，对大阪书价与长崎的原价作对比。因为资料所限，我们无从得知其版本、品质诸方面的信息，发现两地价差达 339 匁，大阪书价是长崎原价的 12.3 倍。如此高的差价不得不使人生疑，这种简单的对比是否合理、科学。为此，再以专志《西湖志》为例，《购来书籍目录》记 1835 年或 1836 年临时船携来《西湖志》"贰拾贰匁"，[30]《新渡唐本市控帐》记 1831 年唐本屋河内屋直助《西湖志》"百五匁"，两地价差 83 匁，大阪是长崎原价的 4.8 倍。另《新渡唐本市控帐》还记 1832 年唐本屋河内茂八《西湖志全图》价"廿五匁"，若以此与《购来书籍目录》所记相比，则大阪是长崎原价的 1.12 倍。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推测性结论，书店出售方志的价格一般约是其入境原价的 2 - 5 倍，高者达 10 余倍尽管少，但也有可能。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唐商在中国的方志收购价。迄今，还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记载。尽管在部分史料中透露出一些价格信息，如：明末藏书家毛晋（1598 - 1659）的善本藏书在清初时被其子毛扆出售给季振宜（1630 - 1674），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记载了当时售书清单与价格：

宋板《江阴志》，四本，六两

《华阳国志》，四本，绵纸旧抄，一两

《九域志》，十本，宋板精抄，八两

清乾隆时藏书家黄丕烈（1673 - 1825）《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也有部分志书的价格记录：《舆地广记》三十八卷（校影宋本），"出百二十金购之（盖因京师风行宋刻之故）。喜甚，展卷一过，知竹垞藏本为确。"《严州图经》（宋本），"为严姓物，严于数年前得之于昆山书集街，价止青蚨三两二钱……云是太仓金元功家物……先是书友携是书来，索值百千文，余末及还价而即取去。"《齐乘》六卷释音一卷（嘉靖本），"此书估价千余钱，余故喜而购之。"[31]但由于毛晋、黄丕烈均以收藏珍本秘籍著称，其价格自然非常高昂，与赴日唐商收购的坊间通行本的价格有天壤之别，缺乏可比性。不过，从日本市场上的志书价格以及书店销售的巨额价差看，唐商贩运方志所获得

的利润应当相当高。否则，唐商也不会这么积极。

## 四、贸易特性与日本的收集意图

二百余年间的中日方志贸易，应当说它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增加日本的图书文献积累都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从整个贸易过程看，尽管中国方面是货物的供应方，但贸易的主动权却掌握在日方手中。除部分时段外，日本主要通过书籍检查和订单发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海关书籍检查，目的在禁止与天主教有关书籍的流入。因禁教而禁止记述有违禁内容的地方志入港，虽然数量极其有限，却是日本方面占据贸易主动权的重要体现。1630 年遭查禁书 32 种中并无地方志，但 1685 年后禁书日益严格，志书遭禁也偶有发生。《贞享乙丑年南京船持渡唐本国禁耶稣书》记载，1685 年南京船带来的《福建通志》被查禁[32]。《御制禁书籍译书》："《福建通志》，贞享三年十二番、十五番船携来，烧毁，令原货载回……《增定广舆记》，宝永七年十六番船携来，部分用墨涂消后退回。"[33]《御国禁耶稣书目》记载禁书新例，方志有《增订广舆记》、《苏州府志》、《仁和府（县）志》、《丹徒县志》、《琼山县志》、《缙云县志》、《新乡县志》、《诸罗县志》、《延年（?）县志》等，并规定携带持有者以处斩罪论处[34]。为防止禁书的流入，日方规定唐船主都要做出自己的承诺。《赍来书目》载，1714 年 10 月南京船主费元龄携带"《大明一统志》一部廿四本四套"，保证"以上所报是实，若带来天主教书，藏匿发卖，通船甘愿坐罪。正德四年九月　日第一番南京船主费元龄花押"[35]。到 1720 年，对于曾经遭禁的《福建通志》、《增订广舆记》等志书，还不是将军德川吉宗一句话，又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了。

对进口什么方志，日方也是按照需要发出订单。清康熙间为配合《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各地普遍编纂了省志、府志、州志、县志。德川吉宗热衷效法康熙皇帝，"仔细地调查当时中国的政治，需要搜集中国地方志，"对中国方志进行了广泛购买，可以说来者不拒。但《大清一统志》久未成书，而"时代已到清朝，不能还是参考《大明一统志》，于是就关心起清代各省通志。"[36]1741 年前是清代通志成书最多的时期，有的省编有一次，有的省编了数次。日本方面对通志输入给予了特别关注。《壬寅入津唐本大意书抄》[37]记载，1721 年日本首次批量输入通志：

> 《大明一统志》、《盛京通志》、《山东通志》、《江南通志》、《浙江通志》、《江西通志》、《湖广通志》、《河南通志》、《陕西通志》、《广东通志》、《贵州通志》
>
> 以上十种为去年渡来之书，呈上御用。《云南通志》亦去年渡来。

此后，不断有成批通志输入的记录。如 1725 年通过宁波籍医生朱来章及朱允光宁波船输入"《福建通志》一部六套、《山西通志》一部六套、《山东通志》一部四套、《江西通志》一部八套、《云南通志》一部六套、《陕西通志》一部八套"等 15 部通志[38]。对此，《槐记》享保十年七月七日条记载："近年所购求'十五省通志'，在日本共有书两部。这些书应该被收集起来。按照从江户向长崎下发预订的次序，望能将书单送出去，以便将其都收集起来。"[39]1733 年又输入通志 14 部 72 帙。1750 年再次进口十五省通志。"以上之十五部是北京及诸省之全志，先年呈上御用书中已有同样之书。其中，十四部为清朝重修之书，仅《云南通志》一部系明版。"[40]

由于日本方面有强烈的需求以及高额利润的吸引，方志流通的速度较快。这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从方志的出版到传至日本间隔的时间有的比较短。如《西林县志》（康熙）、《余庆县志》（康熙）1718 年出版，1728 年被舶载日本，相隔 10 年。《重修赣榆县志》（嘉庆）1796 年刻印，1805 年持渡日本，间隔 9 年。《镇平县志》（乾隆）1783 年刻印，1795 年持渡日本，间隔 8 年。《太平寰宇记》1793 年刊本，6 年后被带到日本。《增订广舆记》1802 年刻本，1805 年被舶载，相隔 3 年。《方舆类纂》在 1808 年出版后 2 年持渡日本。《重修丹徒县志》（嘉庆）1805 出版，甚至当年就被携带到日本。二是从入港到入库时间也较短。

《商舶载来书目》著录 1721 年《凤阳府志》输入，《御文库目录》著录 1722 年人库。《河南通志》（康熙）16 册、《嘉兴府志》（康熙）20 册、《岳州府志》（康熙）8 册、《广东通志》（康熙三十六年本）8 册，《商舶载来书目》著录 1721 年进口，《御文库目录》著录 1722 年人库。《琼浦又缀》记录 1805 年舶载的志书，如《分建南汇县志》、《奉贤县志》（乾隆）、《天津县志》（乾隆）等，《自文化三年至文政五年新收书目》记录 1806 年入库。这说明，方志自入津经过检查手续，再送到江户呈给御文库，大约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与积极输入方志等中国史地书、迫切了解中国情形的态度相反，德川幕府出于锁国心理，对渡日唐商一直心存提防。“凡贸易人到倭，皆圈禁城中，周砌高墙，内有房屋，开行甚多，名土库，止有总门重兵守之，不许外走得知消息。到时将货收去，官为发卖，一切饮食皆其所给。回棹时逐一消算扣除，交还所换铜觔货物，押往开行。至聘去之人，则另在隐密之地。”[41]对唐商要求阅读日本地图等地理书也不允许。据《得泰船笔语》记载，“得泰船”清人杨启堂问日人野田笛浦：“带有日本地图乎？乞一观。”野田笛浦回答：“是吾邦大禁，不许外人看。”[42]

再从中国方面看，对唐船贩运出境的货物，大米、铁、铁器、武器是清廷明令禁止的[43]。至于书籍，以往多是朝廷以赏赐的形式，让外国使节带出境，或者是通过学者和僧人，对日本也如此。地方志等书籍以货物商品的形式输往日本，在日本文献中常常有记载，而在汉文文献中几乎没有。只有 1728 年浙江总督李卫请严防日本的奏折中提到，“据称夷人每事访求天朝故实新闻，诸样书籍无所不有。”曾去日本的朱来章被传唤时，“供出曾带过各项书籍五百本。”[44]大批量的地方志等书籍输出境，海关不可能一点都不知晓。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海关稽查松懈，或在某些官员默许下，商人私自夹带出境。正因如此，清末缪荃孙声称：“海外番舶如日本、琉球，颇用重价购书，江浙之间有司不甚稽查，所关匪细，应严饬关吏搜查海舶，毋许私贩。”[45]江户时代的中日方志贸易可能属于一种半公开的走私贸易。

日本如此重视地方志的搜集，除江户时代日本人有慕华心态外，主要是江户幕府的政策使然。日本是个资源、物质相对匮乏的国家，所需纺织品、药材以及砂糖、矿物、染料、涂料、皮革、纸、墨、笔、扇子、茶等多从中国进口。幕府的中心政策之一就是殖产兴业，努力实现甘蔗、砂糖、油料作物的自产，扩大草药种植[46]，而实现此目标的现实途径便是收集相关资料，从中学习借鉴中国的种植、生产办法。于是，当时日本组织抄录了大量的方志物产。如 1693 年稻生若水开始摘录方志等书中的物产资料，编纂《庶物类纂》，稻生若水去世后，幕府令丹羽正伯等继续编纂，直到 1745 年完稿。《幕府书物方日记》记载了当时利用幕府红叶山文库方志的情况，如 1728 年丹羽正伯利用了《陕西通志》、《西安县志》。1744 年，“除了在《庶物类纂》之中有记载之外，甘蔗的种类和砂糖的制作方法在府志中也有记载，”命令抄录府志中有关甘蔗、砂糖的记载。[47]松冈玄达 1708 年完成《怡颜斋日抄》，1741 年完成《再续州府县志摘录》。1812 – 1928 年，昌平坂学问所主编《地志物产部》，抄录方志 559 种。再从《御文库目录》、《秘库书目》著录的输入汉籍看，1639 – 1720 年，幕府收集汉籍的重点在医书。中医书必然涉及草药，而草药日本又不能自给，需要进口。1721 年后的汉籍输入自然重点转到地方志，以便了解中国草药的产地。1751 年，都贺庭钟点校刊摘录《闽书南产志》，香川脩德称：“海内乂安，民庶丰富，至事无不兴矣……五十年前都下有稻（生）若水先生者出，专习草木鸟兽之学，尔来相继而纪者不乏其人……是故有诸家本草，以及通志之物产，府志、县志之所著，搜索不遗余力。”[48]江户时代摘录方志物产的目的，一方面可能是从中了解一些经济作物、药材的种植方法，另一方面或许要考察中国各地的物产情况，为输入货物提供参考。由此似乎可以推定，江户时代日本输人地方志的重要动机是为了贸易和提高经济作物、药材的自给率，换而言之，即为了搜集殖产兴业所需的经济情报。

此外，对经世致用学问的重视也应当是日

本搜集地方志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方面是为学术研究而收集。著名学者林罗山对中华文化推崇备至，不仅仿效中国总志编了《本朝地理志略》，按山城国、大和国、伊势国、尾张国等记载各国名称、位置、沿革、山川，而且在《梅村载笔》中记录了自己做研究所收集的《方舆胜览》、《大明一统志》、《广皇舆考》、《广东通志》、《山海关志》等方志。自11世纪以来俄国不断向东扩张，17世纪后半叶，其触角已及黑龙江流域的满蒙地区，因地缘政治关系，日本给予了较多关注。1804年，曾任御文库书物奉行的近藤守重（号正斋）出版了《边要分界图考》。该书分考定分界图、辨疑、满洲考等8目8卷。自序称，其编纂目的是了解满蒙的边塞地理、要冲设施。为编纂此书，作者花费了10余年时间，“东西跋涉千余里，咨询周边异域，广泛搜求中国书籍。”[49]书中利用的方志有《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广舆记》、《盛京通志》、《西域闻见录》、《龙沙纪略》等9种。另一方面，日本很早就效法中国而编纂风土记类的地志，虽然中间一度中断数百年，但到江户时代在幕府奖励学问政策的指导下又开始编纂地志。“中国诸县都有县志这一状况给汉学者们以刺激。”[50]为编日本地志而引进方志用来做参考也是重要动机。从江户时代地志的编纂理念、用语、体例等多效仿自中国方志这一特色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地志编修取调所文政间编《编修地志备用典籍》，将《大清志略》、《清一统志地图抄出》、《明舆地图》、《清一统天下全图》、《盛京通志地图抄》等列为参考书目也可证明这一点。

总之，17-19世纪中叶的地方志贸易是在中日书籍交流大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尽管这种书籍的交易属于半公开的走私贸易形式，然而由于多方的参与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仅日本幕府、藩主、大名、学者各得所需，中国的地方志也扩大了流传范围，提高知名度，而且唐商、日本书商也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地方志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中日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批准号：02CTQ003）的资助。

① （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見在書目録·土地家》，见（日）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日本書目大成》第一卷，汲古書院，1979年。

② （日）日比野丈夫可能是最早作专门探讨的学者，所著《德川幕府による中国地方志の蒐集》（《岩井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岩井博士古稀記念事業会，1963年）主要论述了江户幕府德川吉宗收集地方志的原因。（日）大庭脩《江户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舍，1984年）专设“地方志的收集”一项，集中论述了德川吉宗收集方志的缘起，并开列输入的志书名目。（日）山根幸夫《江戸時代に日本へ輸入された明代方志について》（《明清史籍の研究》，研文出版，1989年）则从回忆其1947年利用地方志撰写毕业论文着手，从尊经阁文库、上野图书馆藏明代方志探讨了江户时代输入的明代方志数量。国内学者基本没有作研究。

③ 陆坚、王勇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2-33页。

④ 蓬左文庫監修：《尾張德川家藏書目録》（《書誌書目シリーズ》49），ゆまに書房，1999年。

⑤ 《御文庫目録》，尊经阁文库藏，抄本。

⑥ 有关明末清朝中国地方志东传日本的过程详见2007年1月笔者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交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报告《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该成果正待出版。

⑦ （日）平安書林主人輯：《古渡新渡唐本類書考》，题言，1751年向榮堂本。

⑧ （日）大庭脩：《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戚印平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⑨ 清高得贵修，张九征等纂：《镇江府志》（康熙），张九征序，1674年刻本。

⑩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41页。

⑪ 清张松孙、谢泰宸纂修：《蓬溪县志》（乾隆），张松孙序，1786年刻本。

⑫ 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78页。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7-218页。

⑬ 《有德院殿御實紀附録》卷十，载《德川實紀》第九篇，吉川弘文館，1982年，第243页。

⑭ （日）大田南畝：《一話一言》卷四十，见《日本隨筆大成別卷》，吉川弘文館，1978年。

⑮（日）森潤三郎：《紅葉山文庫と書物奉行》，昭和書房，1933年，第164页。
⑯《南畝文庫藏書目》，见《大田南畝全集》卷十九，岩波书店，1989年。
⑰松浦史料博物館：《（旧松浦家蔵書）図書類目録》，1966年。
⑱（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24－627页。
⑲（日）佐伯富：《康熙雍正時代における日清貿易》，《東洋史研究》16卷4号，1958年。引文中略去与中国无关部分。
⑳（日）大庭脩：《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徐世虹译，中华书局，1997年，第25页。
㉑清叶德辉：《书林清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
㉒（日）西川如見：《增補華夷通商考》卷一、二，洛陽書林甘節堂、學梁軒，1709年刊本。该书记载了唐船出发地及15省到长崎商人，兹选取沿海、内地各2省予以说明。明清两湖无永天府的建置，原文似有误。
㉓匁、目、分、厘等为江户时代货币单位。匁与目同，为金币小判一两的六十分之一，即金一两为银六十匁。分为一匁的十分之一。厘为一分的十分之一。步系比率、利率单位。
㉔（日）濱田義一郎：《大田南畝集》卷八，岩波書店，1986年，第457－458页。
㉕《天保十四年卯臨時拂會所請込》，见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資料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67年，第606页。
㉖《弘化二年巳六番割》，见（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資料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67年，第641页。
㉗（日）中沢弁次郎：《日本米価変動史》，柏書房，2001年，第243页。
㉘清汪鹏：《袖海编》卷一，《丛书集成续编》第65册。
㉙《新渡唐本市控帳（積玉圃記）》，載（日）彌吉光長《大坂の本屋と唐本輸入・史料编》（《書誌書目シリ－ズ》26），ゆまに書房，1988年。
㉚《購來書籍目録》，公文书馆藏，抄本。
㉛清黄丕烈著，潘祖荫辑，周少川点校：《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2，47，50页。
㉜京都書林三組行司：《禁書目録》，见（日）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日本書目大成》第四卷，汲古書院，1979年。
㉝《御制禁書籍譯書》，转引自（日）大庭脩《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60页。
㉞（日）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编：《日本書目大成》第四卷，汲古書院，1979年。
㉟（日）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資料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67年，第241－242页。
㊱（日）日比野丈夫：《德川幕府による中国地方志の蒐集》，见《岩井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岩井博士古稀記念事業会，1963年，第539页，536页。
㊲《壬寅入津唐本大意書鈔》，尊经阁文库藏，抄本。
㊳《舶載書目》第十五册卷二十二，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72年。
㊴《槐記》，转引自《舶載書目》，大庭脩《解題》，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72年。
㊵《舶載書目》第三十九册卷五十六。
㊶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989年，第72页。
㊷（日本）笛埔野田先生、清客朱劉諸氏：《得泰船筆語》卷上，紀藩瓢葉館藏本，関西大学出版部，1986年。
㊸郭蕴静：《清代商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2－345页。
㊹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989年，第75页，76页。
㊺清缪荃孙：《日游汇编》，见王宝平《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6页。
㊻（日）福井保：《江戸幕府编纂物・解說编》，雄松堂，1983年，第250页。
㊼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幕府書物方日記》第十八册，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第122页。
㊽明何喬遠纂，（日）都賀庭鍾點校：《閩書南産志》，香川脩德序，1751年刻本。
㊾（日）近藤正齋：《邊要分界圖考》，序，第一書房，1976年。
㊿（日）高木利太：《日本地誌編纂史概略》，载《家藏日本地誌目録》，1927年。